

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域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 挑战与应对策略

喻丽果, 赵 平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2)

摘要: ChatGPT 类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然成为 21 世纪最具创新性和爆发力的新兴技术样态, 但其所具有的数据垄断、软性渗透以及观念形塑等意识形态属性, 究其本质而言, 是一种“价值中立说”。随着 ChatGPT 类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文化领域的运用, 或将引发算法推荐制约下文化建构主体性“去中心化”、数字霸权掌控下文化内核主体性“被沉默化”以及资本逻辑驱使下文化方法主体性“被操纵化”等隐患。因此, 应从提升建构主体的综合素养、坚守以文化人的目标导向以及加强智能算法的技术规制等角度积极探索规制其隐患的恰切之道, 以助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关键词: 习近平文化思想; 文化主体性; 生成式人工智能;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24)04-0008-07

2023 年 6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文化主体性”的重大论断, “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 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 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1], 并强调“两个结合”为文化主体性的赓续提供了新的势能。“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基因、精神品质以及独特价值体系”^[2], 它突出表现为生活在一定的文化交流场域中的人在面对古今中外文化时, 既能保持自身独立的主体地位, 又能在优秀文化的吸纳中增进文化认同并实现文化创新。作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驱动力量, 基于大型语言模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文物修复、内容创作和文化产品研发等领域展现出强劲的发展潜力, 同时这一技术的本质特征及其内在规定不可避免地带有文化主体所在时空的文化观念。具言之, 基于海量数据和算法技术生成的 ChatGPT 本身具有意识形态属性, 其生成的内容天然地不具备“中国基因”, 相反带有浓厚的西方文化特质及其西方意识形态色彩。当下, 我国正处于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升级的关键时期,

ChatGPT 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文化主体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都是不可预测的。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当代实践中, 如何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语料生成场域中激发人们的文化主体意识, 筑牢属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性价值观, 成为人工智能时代我国文化建设必须要面对的时代课题。

一、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域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现实样态

基于大型语言模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文化的传播、传承与创新中展现出强劲的发展潜力, 不仅极大地改变了文化传播的范式, 也塑造了一个新的文化生命形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我们要“主动识变应变求变, 主动防范化解风险”^{[3]28}。因此, 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的新态势, 如何在文化领域激活中华文明固有的活力, 创造属于新时代的新文化成为一个重大的现实命题。

收稿日期: 2024-03-23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22YJC710063)

作者简介: 喻丽果(1999-), 女,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赵 平(1964-), 男,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传统美德范畴、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E-mail: 975159019@qq.com

1. 碎片文化的弥散化: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资本场域的数据垄断

在网络空间中,Chat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以海量数据为训练来源,不仅可用于处理客观信息,还能为西方国家实现数字霸权提供技术支持。作为西方国家攫取经济利益的数据资本,Chat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加剧了数智时代其在资本场域的数据垄断。在数字生成的语境下,由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仍处于西方国家控制的状态之下,相对应的文化内容的生成也受到原本的社会意识生产模式的影响,经信息技术的炮制而产生出许多狭隘的、极端的、琐细的碎片,最终聚合为“碎片文化”^[4]。碎片文化在本质上是借助智能机器高速的文化内容生成模式以文化“碎片”的方式割裂文化经典,试图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任意剪裁、拼接成“百家布”,以达到在文化上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颠覆的思想预备,阻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良性发展。

实践表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其在技术领域的霸权态势,“大肆推销烙印西方价值理念、生活方式、制度模式和宗教信仰的技术产品”^[5],并在各网络平台实现碎片化传播。其一,传播主体碎片化。生成式内容是一种信息筛选的过程,依凭数字技术,西方国家可通过深度剖析海量数据,检索出符合受众需求的文化内容,迅速并精准地对其进行投放,并将带有西方意识形态偏见的内容内嵌其中,进而实现信息控制和垄断。当下,智能画像及千人千面的应用已得到推广普及,尤以“大数据杀熟”为标识,传播主体的碎片化不断影响着受众的思维方式和话语表达。其二,内容碎片化。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将传统文化带入一个新时代,原先诸如可表达性低、体验感不良的文化形态已难以满足新生代用户的碎片化生活。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生成的知识被‘合法’文化所裹挟”^[6]。碎片化的文化内容往往因缺少整体性的阐释和精细化的打磨,加之缺乏适宜的语境和具体的情景,极易使用户“断章取义”,难以对某一文化内容形成全面、客观的整体性认识,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完整性在某种程度上被肢解。当社会个体不加咀嚼地享受着碎片文化所带来的精神快感时,原有整体的、理性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逐渐被消解,随之产生的是精神空场、信仰迷失和价值虚无等问

题。社会个体的主体性难以得到发挥,长此以往势必威胁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主体性的现代重塑。

2. 虚拟文化的潜隐化: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文化领域的软性渗透

生成式人工智能新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为文化生产、传播、服务与消费形态的迭代更新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囿于内容生成模式的不确定性而制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协同、衔接与融合的过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资本论》等马克思经典文献阐释了机器的作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之间的关系,并指出“只有在共产主义关系下,工艺学上已经达到的真理方能在实践中实现”^{[7] 575}。这表明资本逻辑语境中的问题不是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要想从根本上实现对技术异己力量的克服,就必须扬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技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运用展现出其积极的作用。在信息即权力的智能新时代,ChatGPT的实时交互与沉浸特性使得虚拟文化成为一种具有渗透性与颠覆性的文化形态。从定义上看,虚拟文化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为基础的崭新文化形态。虚拟文化的形成具有技术和文化的双重属性,如ChatGPT类生成式智能新产品将图像、文字等文化要素进行重构和编码,形成符合受众兴趣爱好的文化符号,以交互的形式对主体进行文化渗透。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文化领域的软性渗透是通过虚拟世界的虚拟文化空间而实现的。其一,从起源上看,虚拟文化是网络文化的衍生和拓展,其“遗忘”和遮蔽文化的本然属性,是网络文化借助Chat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网络空间渗透蔓延的结果。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就曾敏锐地指出,随着媒介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本来意义上的文化将失去在场的可能。诚然,受资本逻辑和Chat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裹挟”“共谋”,尤其是Chat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加速着文化形式和内容的解构与建构,在不断丰富文化形态以提高文化传播度的同时,逐渐淡化了文化自身的边界和本真价值。其二,从结构维度上看,可以将虚拟文化理解为借助网络世界的虚拟性、匿名性等特性来迎合自身隐蔽性的需要,以此来消解和遮蔽文

化原初的本真意蕴和内在价值。虚拟文化渗透各大媒介,搅乱文化传播主客体的传导纽带,使文化传承失去了介体条件。在智能新时代,微信、小红书、抖音等成为人们交流互动的新平台,也成为助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新载体。因此,要有效遏制和消弭虚拟文化,就得抢占新载体的制高点,并牢牢掌握话语权,努力承担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以“坚守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背后文化基因、文化密码”^[8]。

3. 娱乐文化的低俗化: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主体空间的观念形塑

正如美国学者安德鲁·芬伯格所言,“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的产物,因此任何给定的技术秩序都是一个朝向不同方向发展的潜在的出发点,但到底向哪个方向发展则要取决于塑造这种技术秩序的文化环境”^{[9]165}。在智能新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不具有形塑主体的价值属性,但技术的背后承载着鲜明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尤其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拟态运用中,传统趋于稳定的知识生产模式被动态的智能知识库所庖代,智能机器高速的信息处理方式将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主体的认知能力”^[10],长此以往,主体的思维方式、学习方法、价值取向、价值观念等会逐渐发生变化。娱乐本是个体全面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依托生成式人工智能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娱乐的本质悄然发生了改变。正如美国学者尼尔·匹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所说“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11]4}

生成式人工智能新技术的应用,使得媒介生态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泛娱乐化”搭乘“智能”列车快速进入“娱乐优先”的意象世界。当今,“泛娱乐化”的精神愈演愈烈,它将原本不具有娱乐属性的经典文本转化为娱乐文本,其追求也从“作品库”变成了“流量池”,所承载的核心关切也都有向娱乐化倾斜的迹象。大众对娱乐文化的追捧,甚至撼动着整个文化生态的堤坝。其一,娱乐文化侵蚀大众的价值信仰。娱乐文化的兴起离不开智能新技术的推波助澜,为了追求流量效应,在娱乐文化的浸染下,文化作品戏说历史、恶搞精英、消解革命文化所推崇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等精神。如“杜甫很忙”“李

白很狂”就是传统经典被娱乐恶搞的典型案列,是“娱乐至死”的产物。其二,娱乐文化销蚀大众的道德理念。当娱乐文化与历史虚无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社会思潮相结合时,娱乐文化犹如一种精神鸦片,使他们沉浸在“娱乐乌托邦”中难以自拔,进而逐步模糊大众的道德理念和理性认同。因而,生成式人工智能会通过娱乐化的数据信息潜移默化地消磨主体的文化记忆,侵蚀其理想信念。

二、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域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风险挑战

马克思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12]776}生成式人工智能既是进一步挖掘和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思想精华的神奇力量,也是在文化建构主体性、文化内核主体性和文化方法主体性等方面引发安全风险的温床。

1. 算法推荐制约下文化建构主体性“去中心化”

文化主体性的生成离不开特定的实践主体,文化建构主体性是指文化建构者的主体性,是指作为实践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在准确认识和把握文化发展规律和趋势的前提下不断创造、创新与发展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13]19}时至今日,Chat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通人事、知人性、懂人心”的内在特质日益渗透于文化领域,并发挥重要作用。从智能的层面讲,算法推荐是通过模拟人的思维并在海量数据的喂养下,不断地对受众的个性化需求进行智能捕捉,从而实现精准推送的先进技术。

算法推荐在文化领域的精准推送主要沿着以下逻辑展开:其一,信息孤岛化。算法推荐凭借自身强大的算力功能从数据化的文化资源中高效锚定、整合、提取深受受众喜爱和追捧的文化内容,实现对文化传播内容和接受人群目标的精准定位。然而,这一过程不仅使得文化是被动接受、一成不变的对象,更加使得文化建构主体在文化创造与表达中丧失自觉能动性。自觉能动性是文化建构主

体基于对自身文化的认知,在时代变迁中能够自觉地参与到文化的传承、生成与变革的过程中,调整和创新文化的内容与形式以满足受众的兴趣偏好与情感需要。“在算法社会中,万物皆数,人们的文化需求作为算法系统中模糊化、抽象化的存在皆被算法转化为可计算的、具象化的数据。”^[14]其二,强化偏好。算法推荐能够基于受众在文化交流平台中产生的互动数据,自动生成用户画像。生成用户画像的前提是受众的文化需求被数据化,经过算法的多轮运算与传导,最终呈现到受众眼前的只是经由算法模拟、预设和建构出来的“人造真相”,因而在算法推荐下建构主体在文化内容的把控上丧失了把关权,久而久之,受众极易陷入“算法偏好陷阱”中。其三,信息泛滥。主体长期接收大量相似或重复的文化内容,严重遮蔽了文化的价值属性。中华文化是以多样化的形式存在的。在高度同质化的文化内容中,文化建构主体犹如“温水煮青蛙”般沉浸在定制化服务中,继而沦为匹兹曼笔下“娱乐至死”似的物种。

2. 数字霸权掌控下文化内核主体性“被沉默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厚重的主体性基因和内核,文化内核主体性回答了中华文明“从哪里来,到何处去”的价值诉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仁爱、民本、和合、大同等价值理念构成了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也是中华文化的内核,是中华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显著标识。“中华文化主体性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接着讲’为核心命题。”^[15]近年来赢得超高口碑的动画短片《中国奇谭》以及“数字敦煌”“数字博物馆”等文化作品,就是 ChatGPT 类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文学、影视、出版深度融合的产物,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文化体验,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不断“活起来”“潮起来”,有效提振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然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数字霸权将自身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灌输到我国的民族文化中,为我国民族文化埋下了文化失真、审美泛化以及技术反控文化等隐患。ChatGPT 类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的文化内容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与艺术美感,值得商榷和深思。

互联网当前正成为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关键场域,但碍于西方国家对数字的霸权掌控,使得中华

文化无法展现出其内在的活力,而逐渐游离于文化“参与圈”之外被动地“被沉默化”。其一,高强度感官刺激下的虚无倾向。西方国家巧借文化全球化与“数字霸权”的东风,源源不断地将附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产品输入中国,以此来达到弱化人们对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文化、中华民族精神认同的目的。ChatGPT 类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更高明之处在于,虚实掺杂数据会输出“虚实同构”的文化形态,在不知不觉中刺激人们的视觉、听觉和触觉,并借助人们对感官刺激需要的心理推崇资本主义文化。在此种情形下,文化内核直接指向了短暂的、浅层次的视觉狂欢。其二,理性缺失下的审美异化倾向。伴随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深度应用,现代社会逐渐陷入审美异化的困境,人们不再满足于“按图索骥”的文本内容,更倾向于追求活灵活现的审美商品。文学作品与商业产品本是一种长期对立的存在,但当文学作品脱离于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而转向智能大数据时,其美学价值也会被吞噬。文化内核不同于产品,可以通过技术以无限复制的形式大批量生产。只有坚守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守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美学价值,才能铸就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3. 资本逻辑驱使下文化方法主体性“被操纵化”

“两个结合”彰显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也开辟了中华文化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文化方法主体性意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圈子中的主体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从根本上说,文化主体性是要以“为我”的主体意识、主体精神,更加积极主动地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服务于中华文化发展的需要。从文化发展的整体演绎来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相互契合的内在逻辑性,如马克思主义对理想社会的描绘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以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知行合一”“实事求是”等^[16]。因此,只有守住马克思主义这一“魂脉”,才能有效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精神命脉提高到新的高度,形成新的文化生命体。从 ChatGPT 类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逻辑来看,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逐渐产生动摇,文化方法主体性甚至

出现“被操纵化”现象。

在由资本逻辑塑造而成的资本主义文明中,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资本逐利本性的驱使下,逐渐沦为“技术资本主义”的工具,严重干扰了社会个体已形成的感性认知与思想认识。其一,资本逻辑导致主流文化缺乏必要的引领力。资本逻辑的“挑选”机制使得承载在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生成式内容加速向数字虚拟空间精神生产蔓延,对主流文化的引领力造成严峻的风险隐忧。同时,西方国家为了实现资本增殖的目的,利用算法进行特定的“文化投喂”,试图解构中华文化的合理性与价值性。其二,资本逻辑驱使削弱主流话语的深度。在资本逻辑与智能技术的联动下,出现了大量来源于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社会思潮,如新自由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文化消费主义等。纷繁复杂、多种多样的不良社会思潮,究其根本在于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西方历史文化的狂热追捧,以及对中华文化中陈规陋习的无知抨击,过于放大问题的严重性,对我国主流话语认同造成不良影响。

三、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域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应对策略

文化与 ChatGPT 类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是时代所趋,运用 ChatGPT 类生成式人工智能推进中华文化智能化、精准化、个性化传播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应有之义。鉴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文化建构主体性、文化内核主体性和文化方法主体性等方面的困境,需要从提升建构主体的话语素养、坚守以文化人的目标导向以及加强智能算法的技术规制等角度发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正面效能。

1. 素养培育:提升建构主体的综合素养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谈到“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17][20]}文化的生命力源于丰富的社会实践,文化主体性的巩固离不开建构主体的自觉性。要想规避 ChatGPT 类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风险隐患,发挥其积极作用,关键在于激发建构主体的主体性自觉,促进文化建构主体综合素养的全面提升,使之成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积极建构力量。

一是提升建构主体的话语素养。ChatGPT 类生

成式人工智能引发的“文化误读”“文化霸权”“文化殖民”,虽可通过提升建构主体的数字素养实现一定程度的纠偏,但也需要提升建构主体的话语素养,以有效讲好中华文化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具体而言,就是要“坚持内容为王、移动优先,让更多高品质、抓住人心的产品破圈出海”^[18],凭借高质量主流文化内容供给抢占话语高地,不仅要立足中国国情和中国实践,更要借助智能技术,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以高度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创造性地表达中华文化,不断丰富和拓展中华文化的价值意蕴。同时,也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19]38}。

二是提升建构主体的数字素养。数字素养意指人们在理解及使用 ChatGPT 类生成式人工智能时的能力和本领以及数据处理时的态度、技能和价值观的综合表现。文化建构主体要不断提升数字素养,并在如何运用技术这把双刃剑上作出审慎的思考,避免片面性盲目追求技术的过度作用,而忽视在文化建设过程中的文化自觉与文化主动。一方面,要加大建构主体的学习培训力度。ChatGPT 类生成式人工智能主要涵括信息共享、人际互动与数据处理等模块,并对此划分模块定期开展专题培训,提高建构主体对 ChatGPT 等的理解和运用能力。另一方面,要搭建动态可持续的数字素养监测平台。建构主体要时刻警惕文化内容中存在的虚假、碎片化信息以免影响自身的价值判断和文化认知能力。通过加强对文化的监管与监测能力,严防错误思潮和虚假价值观对中华文化的冲击,同时充分挖掘优秀文化资源并发挥其潜在的文化价值。

2. 价值引领:坚守以文化人的目标导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内含深厚而坚定的文化自信,也饱含文化人的情怀与智慧。ChatGPT 类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数据处理和内容生成之前已被机械地植入了内含西方意识形态的基因,使得其成为价值渗透的重要工具。“文化主体性归根到底是人的主体性,而人的主体性的凸显必然要通过文化来启蒙和滋养。”^[20]在此情形下,坚持以文化人为目标导向充分利用智能优势,强化价值引领,这是新的文化生命体顺应时代发展的应然之路。

一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21]33}面对当前 ChatGPT 类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文化问题,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这一尖锐的理论武器予以回击,撕碎资本逻辑操纵下“技术中立”的外衣,确保在整个文化传播生态中以价值认同为基础的主流文化引领力持续稳定地生成。此外,要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文化嵌入数据积累、内容生成与分发的全过程,从技术根源上充分发挥主流文化的引领和纠偏作用,打破“数字鸿沟”的魔咒。在增进不同文化圈层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与认同时,在文化交汇融合中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版图。

二是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ChatGPT 类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技术形式,不具备“思考”和阐释理念以及传授系统文化知识的能力。因而,借助“技术赋能”优势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搭建和培育主流文化传播生态,有利于增加人们对中华文化的情感认同与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一方面,要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智能场域的内容供给力。“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22]164},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牢固坚守中华文化之根本。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智能场域的理论阐释力,力求在多元并存的社会思潮中彰显中华文化的价值。

3. 数据治理: 加强智能算法的技术规制

面对技术引发的文化张力与矛盾冲突,应用技术的手段解决技术问题。ChatGPT 类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文化层面的作用机理是将暗含在文本之中关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描述与叙事,以“智能”的形式再次呈现。在本体论意义上,ChatGPT 类生成式人工智能成功的关键在于通过算法机制加以微调,便可基本实现“人机对齐”“人机互动”。当下,针对 ChatGPT 类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文化主体性方面存在的潜在风险,不仅要素养培育和价值引领层面做好引导,更要从技术层面加以规制。

一是用科技伦理规则规避智能算法。科技伦理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底层逻辑要求“驾驭技术、规范技术”,引导技术向善发展,

最大限度地释放技术可供的发展福利,同时缩小和控制可能出现的潜在风险。一方面,要提高智能技术的准入门槛。ChatGPT 类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监管标准既要与国际社会接轨,也要考虑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行业发展的特殊性,建立适合我国智能行业发展的准入和使用标准,引导、规范和强化有关从业人员,提高政治站位与责任意识。另一方面,要以技术力量裁制技术漏洞。生成式人工智能以智能算法的路径实现了类人的生成能力,又以技术的方式实现了对人存在功能的取代。虽然 ChatGPT 类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人的对象化本质的参照物,但当它一旦具有主体性的功能,就会带来人的主体性、主动权向人工智能让渡的问题。因而,要以“向善的技术裁制不良的技术”,以此形塑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点。

二是用法律法规规范智能算法。ChatGPT 类生成式人工智能不是法外之地,必须以法治对其进行制约,使其成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技术助力。一方面,要大力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的法律法规。目前我国已出台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有效防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于文化领域时所产生的价值扭曲和伦理异化。但相较于现实技术所带来的风险,现有法律法规的诠释力和适用性仍有待加强。另一方面,要增强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的立法效率。当前,我国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的立法周期相对较长,通常以其在文化领域、意识形态领域产生问题以后才倒逼立法,缺乏前瞻性与实效性。

参 考 文 献

- [1]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N]. 人民日报, 2023-06-03(01).
- [2] 杨文圣, 蔺雨.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四维意蕴[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4(1): 39-49.
- [3]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 [4] 李俊斌, 王欣. 数字时代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表征、危害及治理[J]. 广西民族研究, 2023(6): 157-164.

- [5] 刘建华. 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属性与风险及其应对[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3(6): 62-69.
- [6] 马文, 陈云松. 文化主体性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价值导向干预[J]. 江苏社会科学, 2024(2): 1-9.
- [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7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8] 夏海燕, 薛君. 巩固文化主体性的价值机理与实践路径[J]. 南京社会科学, 2024(3): 33-40, 66.
- [9] 安德鲁·芬伯格. 技术批判理论[M]. 韩连庆, 曹观法,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10] 杨章文. Chat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属性及其风险规制[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24, 45(1): 57-64.
- [11] 尼尔·匹兹曼. 娱乐至死[M]. 章艳,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5.
- [1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13]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 [14] 黄莹莹, 杨弘. 算法赋能公共文化治理现代化: 逻辑、症候与纾解[J]. 湖北社会科学, 2024(1): 60-67.
- [15] 韩升.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总体性呈现[J]. 中州学刊, 2024(3): 5-12.
- [16] 李捷. 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24(1): 12-21.
- [1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9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8] 李学林, 刘美驿. 以“第二个结合”助力文化现代化的现实考量与路径选择[J].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42(6): 63-69.
- [19]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 [20] 王朝庆. “第二个结合”巩固文化主体性的理与路[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24(1): 41-49.
- [2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 [22]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一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8.

Challenges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Chinese Cultural Subjectiv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YU Li-guo, ZHAO Ping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2, China)

Abstract: Generative AI such as ChatGPT has become the most innovative and explosive emerging technology in the 21st century, but its ideological attributes such as data monopoly, soft penetration, and concept shaping are “value-neutral theory” in essence. The use of Generative AI such as ChatGPT in the cultural field may lead to hidden dangers that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subjectivity is “decentralized” due to the constraints of algorithm recommendation, the cultural core subjectivity is “silenced” under the control of digital hegemony, and that the cultural method subjectivity is “manipulated” by the driving force of capital logic.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actively explore the regulation to control the hidden dangers in the way of improving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the constructing subjects, adhering to the goal orientation to edify the people with culture, and strengthening the technical regulation of intelligent algorithms, so as to help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cultural subjectivity; generative AI;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编辑 王思齐】